

美苏核军备竞赛重启与英国和平运动的复兴

胡腾蛟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0; 长沙学院法学与公共管理系, 湖南长沙, 410003)

摘要: 北约将在西欧部署新型导弹成为 1979—1987 年英国和平运动的导火线, 当然, 该运动的爆发还与英国国内的形势与政策密切关联。这次和平运动具有与 1958—1964 年核裁军运动不同的特点。和平运动对英美两国政府施加了一定的压力, 在吸引英国公共舆论方面获得部分的成功, 但没有改变英国政府基本的防务政策。它的作用在于推动了人们对核战争的反思与和平意识的提高。

关键词: 美苏核军备竞赛; 1989—1987 年英国和平运动; 1958—1964 年英国核裁军运动

中图分类号: K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2)05-0234-07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英国出现了反核和平运动^[1-7]的两次高潮。第一次发生在 1958—1964 年, 它是以所谓的“核裁军运动”的旗帜而为世人所注目的。^[6] 70 年代末, 和平运动“再次成为英国社会一股主要的动力”^{[3](63)}, 从 1979 年一直持续到 1987 年, 其规模也大大地超越了前者。目前, 国内学术界对战后英国的第一次和平运动有所论及, 而对第二次和平运动尚缺乏深入研究^[8-10]。本文将对第二次和平运动进行系统的考察, 以期对于提高整个战后英国和平运动的认识有所裨益。

一

1958—1964 年的英国核裁军运动归于沉寂后, 英国社会似乎已经长久地习惯了对核武库的“冷漠”。那么, 英国国内为什么又会在 70 年代末爆发大规模的反核和平运动呢?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 美国重拾咄咄逼人的攻势引发英国国内强烈的反美浪潮。战后, 苏联的军事力量和军事潜能取得快速突破。1949 年, 苏联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 随后又陆续发展了远程原子弹、陆基弹道导弹和核动力潜艇。60 年代后期, 其战略核力量基本上与美国相抗衡。70 年代末, 苏联的战略性武器实现了从 SS-4 到 SS-5 再到 SS-20 的三级跃进。苏联的武器破坏性潜能达到 6 700 百万当量, 几乎是美国的 3 倍。安东诺

夫-40 可装载 120 吨抵达 5 000 公里的航程。“苏联在缓和岁月……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得到了正式认可, 还把影响扩展到第三世界, 更有甚者, 在反弹道导弹条约中, 他们获得了对美国导弹的技术优势的“限制”。^{[11](447-448)}“俄罗斯人, 最先保卫了他们的大陆(常规武器), 然后就是战略空间(导弹)、海洋和 underwater 区域, 继续解决外层空间。他们的成功是一个熟悉的故事。”^{[2](172-173)}因此, “对抗苏联就是里根了解和思考的美国对外政策的中心内容, 他认为, 正是 20 世纪 70 年代的缓和催生了苏联的军事优势”。里根决心“重建美国作为世界支配性军事大国的地位”。^{[11](442-443)}里根政府刻意渲染苏联的优势与美国的脆弱, 拒绝执行《美苏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SALT II), 抛出削减战略武器谈判(START)的替代性建议, 公开发表赢得核战争和在核战争幸存下来的挑战性言论, 这非但没有取得公众对其观点和看法的支持, 反而从客观上“动员”了广泛的和平运动。^{[2](76)}美国的冷战政策迅速引发了西欧强烈而普遍的反美情绪。整个西欧社会虽然“密切关注着美国, 但信任的程度似乎已经降至自二战以来的最低点。”^{[12](376)}英国的威胁观同样急剧上升, 美国作为英国“最后的安全庇护者”受到广泛质疑, 美国的政策不再“明智而慎重”。苏联固然没有被英国当作是善良之辈, 而美国的形象并不光彩。在亲密的盟友英国眼中, 美国形象正在显著恶化。英国国内关于“美国是否有能力明智地处理当前的世界问题”的问卷调查显示, 1977 年, 肯定回答与否定回

收稿日期: 2012-04-01; 修回日期: 2012-06-02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战后英国和平运动研究”(05BSS015)

作者简介: 胡腾蛟(1978-), 男, 湖南邵东人,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长沙学院法学与公共管理系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冷战国际史。

答大致持平，但到了 1983 年，两者相差 46 个百分点。^{[12](263)}对英国民众来说，对美国的所谓的忠诚无疑增加了战争的风险。尽管欧洲的公众舆论注意到了苏联军事能力快速增长，但由于苏联“在欧洲棋盘上小心地收缩着它的肌肉”，积极发动和平攻势，带给英国的威胁感并不强烈。他们倾向于将美国看作是“国际紧张的刺激者”，而把苏联看作是“处于西方围困之中倒霉的受害者”。联盟和核武器并非冲突的抑制者，而是产生冲突的最可能的因素。^[13]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因此强烈谴责美国的举动，它们并非针对苏联前 10 年军事扩张的反应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第二，新型核武器的部署导致英国社会对核战争的恐惧日益增加。苏联自 1977 年开始在欧洲地区部署射程为 3 000 英里、可携带 3 个弹头的 SS20 中程导弹。作为回应，12 月，北约外长和国防部长特别会议做出了“双重决定”。即美国应积极同苏联在欧洲和全球范围内限制中程核武器的问题进行谈判，如果谈判失败，从 1983 年起，美国将在欧洲部署 464 枚陆基巡航导弹和 108 枚潘兴弹道导弹。这一计划成为此次反核和平运动的直接导火线。人们认为这项计划可能使得美国在欧洲同苏联打一场“有限的核战争”，而遭受灾难的是欧洲国家而不是美国，这只会使欧洲成为苏联核打击的靶子。^{[14](98)}这种对核战争的恐惧在整个西欧是普遍性的。就英国而言，它对于未来全球性冲突的关注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迅速上升了 24 个百分点，大众的悲观主义情绪达到创纪录的 69%，而与 1963 年相比，核战争的预期仅上升至 33%。^{[12](22)}核威慑及与美国的联盟作为战后英国战略的支柱而突然被撕开了黑暗的一面，核武器不只意味着放心和稳定，还是一种依赖与危险；核武器不仅支持威慑，它的失败同样带来致命后果；已有的核武器固然意味着坚固的庇护所，而新型的核武器则提醒它们的受惠者，他们也是可能的受害者，庇护可能同时也是致命性攻击的目标。突然降临的陆基导弹挑战了英国社会的普遍心理，使之认为英国当前的防务已陷入不可逆转的困境。曾经为安全提供“不流血、不流汗和不流泪”的承诺与愿景的核威慑，因为新型核武器的部署而被残酷地打破，威慑与战争之间不可逾越的界线似乎也被突破，严重地冲击了英国社会多年以来对既有的安全依赖的习惯与满足。更糟糕的是，这些武器甚至不是冷战框架下主权国家自主选择的目标。因此，关于核武器的焦虑与对提供者的焦虑恰好复合在了一起。没有人会愿意他们的安全会依赖有一天将自己的社会毁灭的核武器。缓和的破产、核威慑的崩溃意味着两个超级大国因为相互克制的崩溃而愤怒地转向对抗。新一代核武

器之所以恐怖，是因为它们突然将安全赖以存在的致命性前提置于众目睽睽之下。苏联军力的激增使之认识到核力量始终存在着脆弱性，东西关系的迅速恶化加剧了这种焦虑与恐慌。“民主社会对国际紧张的喧嚣与愤怒作出本能的反应，他们习惯将喧嚣等同于真实的战争。”^[13]

第三，英国政府面临的国内困境及其军事措施引发国内强烈的反应。一般地，研究者倾向于认为和平运动是“迟来的兑现”，即和平运动的内爆有其必然性。如果说整个欧洲都因为新型导弹的部署而受到直接威胁，然而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荷兰、西德、英国和美国在数年之内动员起来的大量的群众示威，而在法国、意大利、加拿大和其他北约国家并未出现这样的和平运动？甚至还可以质疑，这样的和平运动为什么并没有在东欧国家出现呢？既然和平运动是非常态性的，那么英国和平运动的爆发，除了上述理由外，必定还有其他特定的条件。因此，我们还必须考察英国社会转型及国内宣传两种因素。

首先是社会转型。80 年代初，国家资本主义的战略已进入“双重死胡同”(Double-dead end)，英国陷入战后史上最糟糕的衰退。政府似乎不再是“战后无尽增长的保卫者”，它无法解决私人繁荣与公共福利、防务支出与社会支出之间长久存在的冲突。尽管英国的社会民主党迟至 1981 年才成立，但是工党政府所奉行的政策没有脱离福利国家的框架。保守党一上台，不但立即对现有的福利国家模式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而且附和美国的军事强硬姿态，严重冲击了英国民众的心理。长期的经济衰退掠走了工党昔日赢取选举的资本，工党左派出于权力与自我合法性的需要而紧紧抓住和平问题，和平运动成为一种与政治相关的力量。权力从战后一代的领导者手中转移到 40 岁一代人的手中，随着他们寿命的延长，生命意识的加强，作为世界末日象征的核武器遭到了他们强烈的反对。“谴责这个世界是为了拯救这个世界”。总之，这一时期，“英国正处在信仰与政治制度双重危机的关头，寻求在中立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冲动中寻找出路。”^[13]和平与缓和的主题因此被前所未有地推到了前沿。

其次是国内宣传。1978 年北约部署中子弹的决定几乎成为所有英国报刊编辑、专栏和读者来信的主题。1979 年的“双重决议”也遭到前所未有的反对。此前的英国和平运动，特别是核裁军运动处于“令人沮丧”的沉寂状态。但在 1981 年之后，这一情况迅速改变。主要原因还在于，历史学家汤普森(E.P. Thompson)当时向英国政府呈送了关于核战主题的小册子《抗议与幸存》以表示强烈抗议。他的反应引发了一场广泛的

公众大讨论。由于电视等大众媒体的存在,政客们寻求体制外的渠道直接向整个大众呼吁成为可能,因此在各方力量的鼓吹与宣传下,经过近20年的模糊和漠视之后,“重新质疑英国的核能力”已经成为英国“一个主要的公共议题”。1980年1月,新成立的保守党政府揭露了工党秘密发展核武器的计划。7月,又与卡特政府达成关于从美国购买三叉戟C4导弹以在90年代完全替换北极星导弹的协议。1982年3月,双方对协议进行了修改,改用威力更大的三叉戟D5系统以替换北极星导弹。英国政府附和美国的冷战举措引发了国内激烈的争论。和平运动者认为,美国空防武器在英国的部署,不但无助于英国防务,反而将英国作为美国部署海神号、F1-11和巡航导弹等远程进攻性武器的军事基地,迫使英国不得不承担作为“美国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的功能。^{[3](65)}保守党政府作出关于武器装备的一些决定,不但激怒了国内的和平主义者,甚至连一些德高望重的军方人士都认为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特别是海军的“现代化”,这对许多人而言,除了核潜艇之外,无异于宣判海军的死亡。新的、持续的争论打破了国内民众对国家安全政策的多年的习惯和满足。北约的战略突然被一些享有很高声誉的专家贬斥为“自杀”或“幼稚”,^{[2](75)}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英国民众对当局权威性的质疑,其结果就是人们必须为自己的未来着想,因此对和平运动的支持迅速增加。

二

1979—1987年的英国反核和平运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979—1980年为第一个时期,是运动的初级阶段。1978年,“争取核裁军运动”在英国发起“中子弹请愿”,25万人在请愿书上签名。1979年,英国掀起约有4000人参加的“争取核裁军运动”。北约通过“双重决定”后,英国再次掀起和平运动的高潮。1980年秋冬,英国、荷兰、德国都发生了大规模的反核示威游行,伦敦的示威群众多达10万。英国最大的和平运动组织——核裁军运动(CND)自战后第一次和平运动就已经成立。在新形势的刺激下,它再次成为英国和平运动“不可挑战的基地”。核裁军运动组织总部成员由1979年的4287名发展到1985年的11万人。^{[4](121)}直接隶属于核裁军运动组织的地方团体的成员也获得发展,1984年估计至少有25万人。基层组织遍及英国各地和各行各业。核裁军运动组织的首要目标是核武器,最终目标是反对所有大规模杀伤性

武器并赞同普遍裁军。^{[15](127)}它结合60年代提出的新要求,提出了新的运动目标:终止三叉戟核潜艇;拒绝所有的巡航导弹;废除英国所有其他的核武器和核基地;采用常规防务的形式;把英国的重点放在创建欧洲无核区方面;对美苏两国同时施加压力,冻结发展、制造和部署新的核武器,废除双方现有的核武器;如果美国或其他北约国家拒绝采用此路线,英国将考虑在北约的地位及是否有必要撤出;促进核不扩散条约的实施,以阻止核武器扩散到其他国家;呼吁和促进英国和第三世界国家将资源从武器生产改向生产其他的社会产品;削减所有国家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样全世界人民才能生存在没有暴力和恐惧的环境中。^{[4](289-290)}核裁军运动组织充当着和平运动的主要组织者。1980年3月,反对北约导弹的地方团体在牛津和剑桥举行抗议活动,核裁军运动组织了大规模的抗议游行。1980年10月,有6万人参加的群众集会标志着在双重决议之后和平运动的复苏。^{[3](66)}

1981—1983年为第二个时期,是运动的高潮阶段。1981年,联合国宣布10月24至31日为裁军周,这成为和平运动力量的关注焦点。10月24日,15~25万人在伦敦举行了游行示威和集会。^{[15](120)}1982年6月,美国总统里根访问西欧和北约前后,伦敦、波恩和罗马出现了大型示威活动,英国约有10万人参加了反核集会和游行示威活动。1983年3月,美国抛出“星球大战计划”,西方的和平运动达到了顶峰。这年秋天,共有500多万人在走上欧洲各国街头示威,因此被形象地称为“炎热的秋天”。1983年4月,核裁军运动组织了25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核示威,有10万人从即将部署美国巡航导弹的格林汉康蒙空军基地,经奥尔德马斯顿原子武器研究中心,直至伯菲尔德核武器兵工厂,手挽手组成一条长达14英里的“人链”,支持反对部署核武器已达3年之久的格林汉康蒙和平营(The Greenham Common Women's Peace Camp)妇女,并反对北约在此部署96枚美国巡航导弹的计划。7月16日,在核裁军运动组织的组织下,数万人在伦敦的美、苏使馆之间拉起一条“人链”,抗议两国核军备竞赛,并向两个超级大国政府递交了抗议书。11月中旬,当第一批16枚美国中程导弹运抵格林汉康蒙军事基地时,在那里安营扎寨的英国妇女,会同各地赶来的3万多名群众冲击了该基地,同军警发生了西欧和平运动史上少有的激烈冲突场面。^{[16](368)}12月,在英国基地部署巡航导弹之前,30~40万人在伦敦举行示威活动。

这一时期的英国教会与当时世俗的反核和平运动保持着区别。英国基督教防务和裁军路线委员会

(Christian Approaches to Defence and Disarmament)、英国宗教理事会和苏格兰教会大会(The General Assembly Church of Scotland)等明确表示反对核武器,但没有一个主流教会(公理会除外)明确赞成单边核裁军。1981年,基督教核裁军运动组织召集了900多人到考文垂大教堂举行会议,创办的季刊《犁头》的发行量明显增加。^{[4](21)}布鲁斯·肯特主教在80年代初改任核裁军运动组织的秘书长,以及反核武器牧师团体、天主教徒和平行动团体等多个新的团体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教会和平运动的发展。1982年,全国核裁军运动组织成员中有23%的基督教徒参加了和平运动。但是教会的态度显然是有保留的。它决定不再在自己的教派里为和平运动提供支持,或不再让自己与世俗的和平运动保持联系。^{[5](211)}1979—1982年,英国国教教会发布的报告《教会和原子弹》对军备竞赛、威慑理论和北约战略进行了深刻的阐述。报告认为核战争与正义战争相悖,核威慑由于要求无条件进行核战争,因而无法从道德上加以接受。报告呼吁英国放弃独立的核威慑,立即取消三叉戟导弹,逐步停止使用北极星导弹和潜水艇,以推动多国参与裁军,并建议撤销美国在英国的核基地。报告激起了宗教界内外广泛的关注。但由于坎特伯雷大主教提出单方面裁军无助于多边裁军谈判并将由于北约不稳定而导致和平将被破坏的主张后,1983年,英国国教教会全体会议以338:100票否决了该报告,但是会议以275:222票通过了伯明翰主教提出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折衷方案。^{[3](76)}虽然投票显示了教会核裁军运动的失败,但是,关于报告的辩论及表决显然有助于拉近基督教反核运动与世俗和平运动的距离。

工会作为英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这一时期一直奉行单方面裁军的立场。但是由于核裁军运动组织是由宣扬后工业社会价值观的中产阶级主导的,工会最初对和平运动的支持是相当含糊的,这一点可以从参加核裁军运动组织的工人人数极其有限上看出。1983年,主张单边裁军的工会元老罗恩·托德(Ron Todd)当选为核裁军运动组织副主席,标志着核裁军运动组织重获工会支持。^{[3](78)}当时,21个全国工会隶属于核裁军运动组织,表明核裁军运动工会(the CND Trade Union Section)在地方和全国范围赢得了工会的大力支持。^{[15](138)}

英国妇女的和平抗议运动尤其引人注目。母亲和平协会、曼彻斯特妇女和平运动、牛津母亲核裁军协会开始组织当地的妇女进行一些反核活动。随后,宝宝反核协会(Babies Against the Bomb)、家庭反核协会在全英范围内纷纷涌现。而妇女解放运动(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在英国大小城镇直接组织了妇女反核威胁协会。妇女和平协会首先在荷兰建立,很快在英国各地建立活动支部,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格林汉康蒙妇女和平营。1981年8、9月间,生态女权主义团体“为了地球上的生命”(Women For Life on Earth, WFLOE)组织了一次从卡迪夫到格林汉康蒙的进军,以抗议计划在格林汉康蒙部署巡航导弹,但没有受到媒体应有的关注,许多行军者自行决定在此建立营地。11月,妇女和平联盟也得以成立,从而加强了妇女团体之间的合作。1982年3月21日,为避免当地委员会的驱逐与威胁,英国妇女在格林汉康蒙邀请男性参加了聚会;次日,又发生了24小时的“纯粹”的妇女围堵行动。这次行动遭致当地委员会的强烈反应,她们的营地被夷为平地后,英国妇女被迫将营地移至100码开外,甚至还有一些妇女因“扰乱治安”而遭到囚禁。9月发生的第二次驱逐没有给英国妇女留下大篷车或帐篷,她们继续在户外生活并组织直接行动。^{[4](242)}12月12日,来自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大约30000名妇女,她们手拉手,组成一条“人链”,将格林汉康蒙整个基地包围起来。^{[15](129)}1983年,和平营的妇女访问了贝尔法斯特(英港市)、意大利西西里的科米索、美国和匈牙利等地,扩大了和平营在海外的影响。格林汉康蒙模式吸引了众多其他国家的妇女,推动了其他新营地的建立。1982年5月24日被确定为“国际妇女裁军日”,表明妇女和平运动获得了跨国性的影响。

1984—1986年为第三个时期,是运动的衰落阶段。大规模的和平运动,没有能够阻止北约按计划部署美国导弹的决心。1984年6月9日,里根访英期间,20万人的反核游行使伦敦市中心交通阻滞数小时之久。8月26日,核裁军运动组织发表声明谴责苏联的远程巡航导弹试验。^[17]此后,反核和平运动开始走向衰落。1986年,英国主要的核基地发生大规模的道路围堵;天主教核裁军运动组织的“不服从游行”导致不少人被捕;核裁军运动也组织了一系列“静坐”示威活动。^{[15](128)}这些事件意味着此次和平运动最后的“演出”。

三

英国的两次和平运动具有不少的共同点。第一,都在相似的背景中爆发。例如新武器系统的呼然而至、美苏权力的黑影以及东西方关系的紧张与冷峻等。如同50年代一样,第二次和平运动一方面是因为英国关

于武器的决定引发的,另一方面是由于更加广泛的国际事件、军备竞赛和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增大而推动的。英法入侵埃及、苏联对匈牙利的干涉、古巴导弹危机构成了第一次和平运动的国际背景。伊朗人质危机、苏联入侵阿富汗、波兰局势的紧张以及战略武器控制谈判的受挫,这一系列事件使得整个70年代的缓和让位于第二次冷战。第二,都体现了后工业社会模式,都是中产阶级“表达型”政治理念的体现。主导和平运动的中产阶级一般就职于福利、教育和社会性等职业,商业和政党作为代表工业社会模式的两类主要机制在两次和平运动中占据的比例都不高。运动的参与者都强调防御和外交政策原则的推进,并从这种推动过程中获得利益与满足,而不是为了实现获得特定的物质主义的目标。^{[3](67)}第三,都未能改变英国政府的防务政策。

但是,两次和平运动的区别也是明显的。第一,尽管两次运动的爆发都有苏联的因素,但是,第一次和平运动更多地被认为是苏联奉行扩张主义政策招致了西方的恐惧,最终导致了西方推动反共主义及其联盟。而70年代的情形正好相反,英国将美国看作是现状的挑战者,寻求扭转70年代以来美国权力颓势的强硬姿态导致了第二次和平运动的爆发。第二,第二次和平运动还得益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益增长的环保主义和女性主义的推动。20世纪50年代,西方政府与和平团体在核能的民用与军用方面尚能保持着一条清晰的界线。随着技术的变革,到7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只要拥有核反应堆则发展核武器变得容易起来,因此,英国的核裁军组织很自然地将其政策拓展到民用核反应堆上。环保主义者不仅关注核武器对国家安全和人类的威胁,而且也关注因为核反应堆的存在导致出现骇人的核辐射等环保问题。这样,既产生了同情和平运动复兴的政治激进主义选区,又为和平运动储备了经验。环保主义者的抗议运动通过运用娴熟的科学经验,向法院要求合法性的意义,动员地方团体和地主政府去反对建立核反应堆的提议。80年代的运动延续了这一策略性资产。女性主义同样推动了和平运动的发展。“和平运动和女权主义已经成为英国和平最大的事业”^{[3](70)}。它促使妇女参与激进的政治当中,推动了非正式组织模式的社会化,拓展了运动的社会学意义。和平运动还与其他社会运动交互在一起,为地方市民行动、环保主义和女性主义参与其他运动提供了经验与教训。第三,由于国家控制着战略核武器,与第一次和平运动相比,第二次和平运动更加强调英国单方面放弃核武器。第四,第二次和平运动取得成功的另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关于和平运动

与核裁军、体现中产阶级价值的出版物的涌现。不仅成立了相关的出版社,而且左翼出版物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50—60年代的和平运动与出版物的运作都存在着大量的商业性障碍。^{[3](70)}两者因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第五,反美主义对英国政治制度的深层次方面产生了影响。战后,英美两国的安全政策紧密地捆绑在一起,第二次和平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英美形成的国防共识。

四

战后英国的第二次和平运动无疑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但西方对80年代包括英国在内的整个西北欧的和平运动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一种观点认为,第二次运动并非只是附和50至60年代的抗议,实际上揭示了“世俗的转型”。富有战斗力的抗议运动不但冲击了西北欧国家的决策程序,获得了对其安全政策的永久否决权,导致传统精英最终失去了对国家安全政策的权威性,开启了“公众参与核决策”的时代,而且前所未有地影响了北约的“社会结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80年代的和平运动并非一次“世俗的突破”,而是附和50年代运动的另一次“周期性爆发”,符合25年一次的周期律。这次和平运动仅仅是由“有限目标驱动的抗议与反叛”,没有导致西欧国家对安全政策失去控制权,也没有造成“数十年以来联结跨大西洋契约韧带的断裂”。^[13]笔者认为,无论是“世俗的转型”还是“周期性的爆发”,都无法完整地评价英国第二次和平运动的历史意义。总的来说,英国和平运动没有取得既定的目标,但它还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英国和平运动仅仅体现了一种特殊的力量。作为自发的群体性社会运动,没有证据表明英国和平运动在整个西北欧地区的和平运动中起着领导作用。但它还是具有溢出效应,西欧、北欧、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苏联东欧地区主要的国家掀起了和平运动的高潮,“成为冷战期间和平运动最后的大动员”。^[18]1980年成立的欧洲核裁军运动(END)起源于英国的核裁军运动(CND),在英国拥有支持者。但两者的关系既非敌对,亦非隶属。欧洲核裁军运动在伦敦设立了办公室,但它不是欧洲运动的总部。^{[15](118)}

英国和平运动也没有改变英国政府基本的防务政策,但在吸引公共舆论方面获得部分的成功,它有助于展开关于英国战略思想和国防部署的广泛争论,的确是“战后平民主义肌肉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展示”。即

并非通过自我选举的组织，而是运用包括大规模游行示威、围堵等在内的草根与抗议政治的工具寻求对政治制度施加压力，追求政治目标的实现。“大众的动员”迫使英国政府不得不为推动美苏缓和、重新开始控制军备谈判作出某些努力，宣布了英美关于美国导弹发射权的“两把钥匙”协议，即未经两国政府首脑共同同意，不得从英国领土上发射美国导弹。和平运动影响英国政府政策方面取得的另一个成就是，100多个由工党控制的地方当局宣布成为“无核区”，拒绝执行1982年保守党政府的民防计划，迫使政府宣布民防演习推迟。和平运动对工党的影响尤其深远。工党内部对核武器的看法本来就存在着深刻的分歧^①，而这种分歧由于和平运动的爆发加剧。1979年，工党败选后，工党左派旗手安东尼·韦吉伍德-本(Anthony Wedgwood-Benn)和迈克尔·弗德(Michael Foot)开始介入和平运动，使得和平运动由初期的松散组织发展成为卡拉汉的反对力量。1980年11月，工党第79届年会通过了一项“左翼”决议，主张英国单方面裁减核军备，退出欧洲共同体，扩大国有化。这些主张遭到党内温和派的激烈反对，工党内部分歧表面化。1981年1月24日，工党特别会议又通过了一项选举党魁的新办法。两派矛盾更加激化，终于导致工党出现50年来最严重的分裂：3月2日，12名议员退出工党，并宣布6周内成立“社会民主党”。

对美国而言，随着包括英国在内的西北欧国家的反核和平运动的兴起，美国国内也出现了强大的和平运动浪潮。在和平运动强大的压力之下，美国不得不稍敛强硬姿态，借鉴和平运动的提议，重启与苏联的军控谈判，寻求双方均不在欧洲部署导弹的“零选择(Zero Option)”，以平息强大的反美主义和中立主义浪潮，维持美欧合作，弥补已出现的裂痕与分歧，在反苏反共中形成合力。戈尔巴乔夫意外地接受了这种非对称性的提议，最终导致了冷战进程终结的加速。和平运动者阻止未来战争的全面爆发和核武器的扩散，希望“安全和有效地管理冷战”，尽力避免将世界拖入到毁灭性的核战争之中，从这个意义上看，和平运动的确“塑造了冷战政治的轮廓”。^[18]

抗议运动的失败是因为它的内在缺陷。第二次和平运动不仅是由新型导弹的部署引发的，还与英国国内转型而导致广泛的政治批评以及要求自由民主的“重塑”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呈现出“反体制政治”的特点。首先，与所有的“反体制政治”运动一样，它也面临着先天性不足的问题。和平运动中的“反精英”试图冲击和弱化安全政策中的传统精英，他们寻求操纵的议题由于过于弱小而难以动员大众或确定选

举结果。社会运动试图以最快的速度动员最多的人员，一段时期内他们或将能够由于具体的目标而成功地克服彼此的意识形态分歧。但当1983年底第一枚将要部署的导弹如期而至时，组织的问题便遭到猛烈反弹。因为不同派别的不满与分歧，面对冲突性的需求时，要么退回到他们的合作共识之中，要么通过某一派别夺取整个运动而破坏它的统一性。大众主义群体难以像政党一样在艰难的环境中存活下来。由于时间的推移而带来的厌倦感成为草根运动致命的威胁。其次，那些试图吸收和挫败他们的政党，他们谋取的是权力而非原则，这与纯粹的和平主义者是很不相同的。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和平运动倡导者的建议被接受，他们真的就能够解决安全问题和阻止核战争吗？改变核武器的数量、质量、核地点以及摧毁人类的其他手段并非真正的替代性选择。这样的建议“仅仅显示了知识的贫乏和对问题理解的不充分”^{[2](91)}，也严重低估了刺激军备竞赛的国内和国外因素。当前的安全政策处于混乱之中，它继续以更高的成本导致更加的不安全。改变核武器装备或战略的建议很容易整合到军事和政治发展的主流之中，即进入到军备竞赛本身之中。如此结构性的缺陷与外部威胁混杂在一起，因此运动很难取得理想的效果。

当然，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如果没有和平运动表达的普遍反对核军备竞赛的和平信念，也许1986—1987年间的裁军谈判就无法取得重大突破。“在某种意义上说，和平运动赢得了战争，即使它似乎输掉了所有主要的战役。”^{[5](27)}反核和平运动的真正作用并不在于它是否阻止了新型导弹的部署，而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了人类的和平意识。也许，这样的质疑是有道理的，是否单独存在着一个和平运动，并没有受到美国政府的刺激和鼓动呢？

注释：

① 工党内部关于防务的意见可分为“完全的大西洋主义”“无核北约”和“脱离北约”三种不同的主张。

参考文献：

- [1] Richard Taylor. Against the bomb: The British Peace Movement 1958-1965[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2] Peter van den Dungen. West European Pacifism and the Strategy for Peace[M]. Basingstoke: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5.
- [3] Werner Kaltefleiter, Robert L. Pfaltzgraff. The Peace Movement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M]. London & Sydney: Croom Helm, 1985.

- [4] Richard Taylor, Nigel Young. Campaigns for Peace: British Pea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7.
- [5] Guido Grunewald, Peter van den Dungen. Twentieth-century Peace Movement: Successes and failures[M]. Lewiston: The Edwin Mellen Press, 1995.
- [6] 熊伟民. 1958—1964 年的英国核裁军运动[J]. 世界历史, 2005(3): 50—58.
- [7] 熊伟民.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英国妇女的反核和平运动[J]. 长沙大学学报, 2004(3): 49—52.
- [8] 王振华. 英国反核和平运动的发展及其面临的问题[J]. 西欧研究, 1986(6): 12—15.
- [9] 杨春梅. 英国反核和平运动研究(1979—1984 年)[D].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2005.
- [10] 汤凌. 20 世纪 80 年代西北欧反核和平运动研究[D].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2006.
- [11] 孔华润. 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M]. 王琛等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4.
- [12] Gregory Flynn, Hans Rattinger. The public and Atlantic defense[M]. Totowa, N.J.: Rowman and Allanheld, 1985.
- [13] Josef Joffe. Peace and Populism: Why the European Anti-Nuclear Movement failed[J].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87, 11(4): 3—40.
- [14] Gerald Segal, Edwina Moreton, Lawrence Freedman, et. Nuclear War and Nuclear Peace[M].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83.
- [15] April Carter. Peace Movements: International protest and world politics since 1945[M].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Inc., 1992.
- [16] 李巨廉. 战争与和平: 时代主旋律的变动[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9.
- [17] 英争取核裁军运动代表团访华[N]. 参考消息, 1984—11—01, (4).
- [18] Benjamin Ziemann. Peace Movements in Western Europe, Japan and the USA during the Cold War[C]. Essen: Klartext Verlag, 2007: 237—239.

Restart of US-Soviet Nuclear Arms Race and re-emergence of the Peace Movement in Britain

HU Tengjiao

(Department of Law and Public Management, Changsha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03, China;
School of Histor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The NATO was going to deploy new missiles, which led to the Peace Movement of Britain from 1979 to 1987. The movement, different from the 1958-1964 CND, was also attributed to the domestic situation and policy in Britain. Although it put some pressure on the Britain and America as well as captured the public attention to some degree, it failed to change the basic policy of defense of the UK. Besides, it promoted a rethinking of nuclear war and an awareness of peace among people.

Key Words: US-Soviet Nuclear Arms Race; The Peace Movement of Britain from 1979 to 1987; 1958—1964 CND

[编辑: 苏慧]